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生成长百卷读本一

(75) 红星闪耀照中华



先锋新形象（学生成长百卷读本 75）

泰山挑夫 ——记全国教育系统劳模罗道富

1994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沈阳市财会学校的校园里，师生们正忙碌地植树。有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同志，他既不用小车推，也不用两个人来抬，而是把带着湿土的树苗，捆成两捆，一前一后上肩一挑就走，他一趟又一趟干得又多又快。正刨树坑的同学有些吃惊地问老师：“这位挑树苗的师傅是哪儿来的？”老师一愣神，随后笑着指着那老同志的背影说：“他就是咱们学校的罗校长呀！”

是的，从外表和衣着打扮看，罗道富太不像沈阳市财会学校校长了。他中等身材，瘦瘦的，棱角分明的脸上时常挂着和善的微笑，眼睛里闪烁一股自信、执著的光。他在两年前还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或一件旧夹克衫，里面的衬裤还打着补丁。他大概从未想过八、九十年代的中学校长应该是一副怎样的打扮。

谁能想到这个外表有点土气的罗道富却在1995年金秋，向新闻传媒郑重披露：沈阳市财会学校创下了在全市职业学校中连续三年学习及格率，实习合格率，珠算等级和计算机操作合格率5个100%的新记录！

这样的教学成果，不但在辽沈地区，就是在全国也极少见，新闻界誉之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奇迹”。罗道富率领全体师生为沈阳财会学校创下了一个奇迹，他自己也因办学校成绩卓越而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的称号。回顾创业的艰辛和攀登的执著，乔乃鼎书记说：“有的人从罗校长关心教工生活，把温暖送到每家每户，将他比喻为‘热水瓶’，外冷内热；有的人从他勤勤恳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朴实作风方面把他比作‘老黄牛’，我看都对。但我觉得从他对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和肩负重担从不叫苦的坚韧性格看，他更像‘泰山挑夫’。”

罗道富就是靠“挑夫”精神把目光凝聚在学校发展的大目标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肩负普教和职教的重担，开拓新的门径。作为农民的后代，罗道富的血液里流淌着天然的淳朴，勤劳和坚韧；作为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他有开阔的胸襟和视野以及超前的敏锐思维。在他身上农民的淳朴和知识分子的敏锐有机地交融着，使他把少年时代振兴祖国教育事业的梦想和夙愿化为超前的开拓胆略。

罗道富的出生地，河南省罗山县高家寨是一个距县城100多公里的偏僻山村。由于家里穷读不起书，罗道富从小就干起放牛、种田、砍柴、推磨等农活。直到10岁那年，赶上家乡解放，他才上了半年农民业校，然后转入小学四年级就读。从此，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年年在班级名列前茅。

然而读到初一时，父亲再也供不起他上学读书了。父亲强忍着眼泪对罗道富说：“娃，咱家没钱再供你上学了，回家吧！”懂事的罗道富摸着自己朝夕相处的书包，难以割舍地流泪点了点头。就在罗道富眼看要辍学的时

候，教数学的刘老师实在不忍心让这样的好学生辍学，从县城转道赶来，劝说罗道富的父亲，哪怕借钱也要把孩子供下来，别误了孩子的前程。父亲托人找关系，在乡里的信用社借了点钱交了学费，罗道富读完了初高中，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郑州大学政经系。

1981年罗道富调到沈阳市财会学校的前身123中学当校长。从1981年起，罗道富率领沈阳市财会学校的师生员工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15年迈出三大步，使学校由一所全区落后的普通初中，一跃而成为国家教委备案的省重点职业学校。

罗道富迈出的第一步，从1981年到1983年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一所全区最落后的学校，改造成全区的先进学校。罗道富上任的123中，学校环境脏乱，设备破烂不堪，更严重的是面临“困难”：领导班子严重不和；教师队伍人心涣散；学校纪律松弛，学生无心上学；教学质量全区倒数一二。

面对这种局面，罗道富首先从抓领导班子的团结入手。他语重心长地对新组建的班子成员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和谐，齐心奋进。希望大家话不要说大了，劲不要使小了，事不要办虚了，有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干好了，功劳是大家的，干不好责任由我来承担。”话语不多却句句都打动了班子成员的心。从此班子成员拧成一股绳，人人都奋力工作。接着他又狠抓了教师队伍的建设，使“能者上，庸者下”，并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每个教师都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从而使教师队伍面貌焕然一新。在教学管理上，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打破快慢班制，明确提出“学习面前，人人平等，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让每个学生都有成材的机会”。

两年后，罗道富的做法成功了。由于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该校已从全区升学率倒数第一而跃居第三。

罗道富迈出的第二步，是从1983年到1989年，大约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把一所普通中学改造成一所专业化很强的职业高中。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等教育也在酝酿着一场大的改革和调整。罗道富分析了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前景，并参照了国外办职教的路子，与领导班子协调一心，毅然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快作出了创办职业技术学校的超前战略决策，从而使123中成为沈阳首批创办的职业学校。

1986年年底，学校停止了初中招生，正式挂起了“沈阳市财会学校”的牌匾，学校开设财会和计算机两个专业。沈阳市财会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让社会各方面信得过，逐步博得了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90年代初至今的五、六年，罗道富带领沈阳市财会学校迈出了第三大步，使这所学校成为沈阳市培养初、中级财会人员的支柱学校，同时迎来了学校建校以来全面发展的辉煌时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对人才不断变化的需求，特别是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急需，罗道富在90年代之初，果断

地调整了学校的专业结构。这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既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又可使学生直接面向财贸、金融、中外合资等企事业单位择业。

15年来，罗道富这个“泰山挑夫”以坚韧执著的毅力，瞄准教育改革的大目标。以过人的胆识，扎实的作风，向“泰山极顶”登攀，一步一身汗，一步一重天。

面对学校的发展和成就，罗道富总是真诚地说：“财会学校成绩的取得靠全体教职工和领导上下齐心的奋斗，靠的是团结在领导班子周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罗道富性格内向，话语很少，但却总是把全校上百名教职工的冷暖疾苦默默记在心里，并且常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他不愿先说再做，更不会只说不做，而总是做了再说。

在罗道富的领导下，沈阳市财会学校享有“专业设置稳定、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高、毕业生素质好、育人环境优良、实习设备先进”六大优势，近几年曾两度被评为市教育教学先进学校，1993年被评为省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国家及省、市有关领导曾多次来校视察指导工作，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和教学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学校出了名，罗道富也入了教育名人传，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获得各种荣誉十多项，面对这些，罗道富平静地说：“一切成绩和荣誉归于全校师生，我只是做了一个校长应该做的工作。”

南极腹地的杰出女性——记女地质学家金庆民

从 1961 年到今天，金庆民已在地质战线上辛勤工作了 30 多个年头了。这期间，她曾两次深入南极考察，是世界上第一个深入南极腹地的女地质学家。

1938 年，金庆民出生在六朝古都南京市，聪明活泼的她学习成绩十分好。一次偶然的机，使金庆民对地质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她一心想长大了当一名地质学家。

17 岁时，她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

5 年的大学生活，使金庆民对祖国各地的地质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我国幅员辽阔，矿藏丰富，可是我国的地质勘测事业却刚开始。她更加努力地学习，决心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

毕业后，她自愿提出分配到新疆。从此，金庆民就在新疆扎下了根。

当她刚到地质大队时，队里看她是个女毕业生，就安排她留在办公室工作。金庆民急了，说：“队长！我是来搞地质勘测，来找矿的，不是来坐办公室的。我要和其他同志一起到野外去！”

队长可不相信眼前这个白白净净的姑娘，说：“不行！我们队里的规矩是，女同志从不到野外去！”金庆民更急了：“以前没有女同志，现在我就作第一个到野外去的女同志吧。”

队长拗不过金庆民，说：“你决心一定要去，那就先试试吧，若吃不消了就说一声，我再给你换！”

20 年来，她和男同志一起在戈壁上食宿，在烈日下勘测。在变幻不定的沙漠里，她也迷过路，被困在野外过。但每一次，她都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她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长期的野外工作，磨练了她的意志，增长了才干，练就了一身适应艰苦环境的本领，树立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1981 年，金庆民调到了南京南极地质矿产部。从此，她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1986 年，金庆民得知南极考察队分给了地质科学院一个名额。她凭着自己 20 多年来练出来的体魄，从事地质勘探工作的实践经验，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经过她强烈的要求，领导终于批准了。

与沙漠戈壁西北风相处了 20 年的金庆民，现在又与大海、冰天雪地打交道了……

起初，金庆民还不能适应海上的颠狂，而他们乘坐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又遇到了狂风巨浪。

甲板上的机器因船的摆动而开始松动，金庆民便与几位男同志冒着被巨浪卷入大海的危险，爬上甲板，将设备重新绑紧。尽管难以忍受晕船的痛苦，金庆民仍坚持每天观察情况，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并逐日地记航船笔记和生

活日记，将沿途的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了下来。她还作着各种宣传，鼓励晕船的同志们多吃饭。

历尽千难万苦，金庆民与战友终于踏上了冰雪王国的大地，抵达了中国南极长城站。

南极位于地球最南端，是一块未开发过的地方。它含有丰富的矿藏，同时，由于它没有人为的破坏，没有污染，是进行各种科学考察的好地方。但南极常年冰雪覆盖、暴风怒吼，被喻为“地球的冰库”、“世界的风极”和“白色的沙漠”。

金庆民和男队友们一道战胜严寒和恶劣的天气，参加了长城站的扩建。45天劳动中，她参加了修码头、卸运物资、盖房、修路等工作，凡男同志能干的，她全干。后来，他们又将15000吨物资全部卸运上岸，抢建了实验楼、健身房、高空物理实验室等设施。

完成了建设任务，她开始了南极考察。她和队友们顶着暴风雪，克服了重重困难，每天行进数十公里，绘制地图，采集岩石标本，完成了自己的考察任务。

从南极回来，她的干劲更大了，她废寝忘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南极考察分析工作，总结了这次考察的成果。同时，她又觉得有好多工作没完成。她还想重返南极，为祖国采集到更多的科学资料。

重返南极的机会终于降临了。

1988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她参加了中美双方联合举办的攀登南极最高峰的科学考察，她仍然是唯一的女性。

南极最高峰被称为“死亡地带”，那里山势险峻，大部分地区终年覆雪；没有生命存在，即使夏季的气温也在零下40℃左右。那里条件极为恶劣，时刻存在着生命危险。金庆民并不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危险。临行前，她一再嘱咐她的儿女们，如果妈妈遭到不幸了，不要难过，要照顾好爸爸，要好好学习。

11月25日，中美探险队6人抵达了目的地。

第三天，她独自一人留在了营地，其余队员都外出去了。临行前，同行队员关切地说：“金老师，你一人在这里要特别小心！天气不好，千万不要离开营地！外出时，千万不要爬得太高。”

金庆民笑着说：“别为我担心，我家中还有丈夫、儿子等我回去呢！我会完成任务，安全回国的。”

然而，当同伴们逐渐在眼前消失时，她这才感到了空寂，四周白茫茫的没有边际，耳旁只有风在呼呼地响。“只有我一个生活在这儿了。”她感到神秘莫测，她也明白了这儿为什么称为死亡地带。

但她仍然充满信心，她要尽快了解这片土地，这个独特的世界。

和战友分手第四天，她在一道山脊的冰层里发现铁矿矿床。她大喜地喊道：“哦！有铁矿啦！有铁矿啦！”但是这个矿场储量多大呢？她决心继承

考察，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危险。

这时，一不小心，她的脚卡进了冰裂缝中。“不好！”她叫了一声，赶紧用冰镐扒住冰块，奋力向上拔。她已经走了很多路，浑身无力。但她知道，如果一松劲，脚就再也拔不出来了，自己将会在这里冻僵，铁矿带就再也不能找了。

“我必须活下去！为祖国、为事业、为丈夫、为儿女，我必须活下去！”

她咬紧牙关，奋力往上拔。终于，她成功了。她又沿着冰坡攀登，艰难地爬着，采集样品，绘图拍照。

她细致地对铁矿带作了全面考察后，从腰间取出红旗插在了矿体上。她心中的激动与高兴化为了这样一声：“祖国啊！为你的儿女骄傲吧！”

当同伴回到营地后，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激动得抱成一团。回国后，地质部授予她部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荣记一等功。1989，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0年10月16日，金庆民带着12名队员，又一次踏上赴南极的征程。她已经年过50了，这次过后，可能就不能去了。她在南极还有许多事没做完，或许，这些事她一辈子也做不完，但她要尽力去做，做得越多越好……

南街村的引路人——党委书记王洪彬的故事

地处河南省腹地的临颖县南街村，每天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们前来参观考察。人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无不发出啧啧的称赞。

宽阔、笔直、平坦的大道全由水泥铺成，快车道两侧的绿化带中栽着塔松、樱花、紫荆、月季……；豪华的柱灯站在路的两旁。入夜，华灯齐亮，把南街照耀得亮如白昼。

最给人们以现代化气息的是，这个只有7000余户居民的村庄已装上2000门的程控电话。村干部、厂领导都配有BP机和大哥大。

在村内，到处充满革命化气息和政治热浪。大街上、厂区内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只要村里有了如卸火车一类的突击性劳动，高音喇叭一响，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男女老幼争相奔向劳动地点。这里全村人都可以享受面粉、油、水、电等项的免费供应；每户都可以分到一套92平方米的住室，住室内的21英寸彩电、冷暖空调、组合家具、席梦思等全由集体配给。

人们惊叹这儿的人民的生活时，不禁会问：“南街村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这里的带头人是谁？”

村党委书记王洪彬能回答这些问题，也只有他能完满地解答这些问题。

四十多岁的王洪彬看上去很普通，中等身材，说话缓慢。刚一接触，让你感到他貌不惊人，语不压众。然而等你和他交谈之后，他浑身上下透着的朴实、诚恳、坚韧、沉稳一定吸引你去探索他，研究他。

正是他领导了南街村的建设。

1964年，年仅13岁的王洪彬小学毕业后就回乡当上了“知识青年”。喂猪、喂牲口等脏活、累活他都跟成年人抢着干，有一次竟累得吐血。队长怕他累出毛病，派他到地里看庄稼，防止人偷和猪羊践踏。社员们都喜欢他，说他诚实，善良，没有私心。1971年，大家一致推荐他当生产队长，这一年他20岁。

1976年7月1日，王洪彬站在鲜艳的党旗下，庄严地宣誓入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青年，成了这个拥有3000口人的村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他似乎有用不完的劲，带领全村人平整土地，打井修渠。南街村的土地大部改成了水浇田，他又领着大家埋电线杆，加电线，买机器，使全村耕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变，粮食和烟叶的产量成了全县之冠。

如何带领全大队的群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新步伐？如何让群众过上更富足的日子！这成了王洪彬终日思考的问题。夜晚，王洪彬躺在家中那破旧昏暗的小屋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全大队要富裕，队里的工业一定要发

展。社员都要住上宽敞、坚固、明亮的房子，装上电灯、自来水、电话……

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村党支部委员，大家一致赞同。可是如何干，大家谁也说不出来。王洪彬决定：走出去，到外地参观取经。

地处黄河边上的新乡县刘庄是全国走集体致富道路的一面旗帜。1978年冬天，王洪彬亲自开着拖拉机，带上全大队的干部驱车200多公里，到刘庄参观学习。刘庄在搞好农业的同时，又大力发展工业，现在刘庄人已过上富裕的生活了。集体盖起了宽敞的住宅楼，多数农户已经搬到了新家，社员们吃的面粉、肉、蛋、蔬菜都实行了供给制。

这一切使王洪彬眼界大开，激动不已。

回来后，他立即召集党支部所有成员开会。委员们一个个抽着廉价纸烟，热烈地讨论着。要发展工业才能致富他们都明白，但是究竟干什么呢？无技术，干什么好呢？

劣质烟呛人的烟雾弥漫着办公室，大家已经说得口干舌燥，可谁也想不出好主意来。王洪彬突然眼前一亮，对大家说：“咱村多的是坡岗地，种起来也不方便。如果挖掉一米多厚的土，烧成砖，一、可以把坡地改造成平地，二、可以卖。眼下盖房的很多，不愁卖不出去。”一语提醒了所有的人，支委们作了办砖瓦厂的决定。

仅用了一年多时间，王洪彬就带领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工业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业就实现了工业收入和农业收入的接近。南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85年，南街村又建起了糕点厂和养猪场。1986年，原来的面粉厂又增加了新的设备，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87年，又利用面粉厂的副产品麸皮加工成饲料，村里又办起了大型养鸡场。

连续5年，王洪彬带领南街村民一步一层楼，集体经济以年增长率为80%以上的高速向前发展。

改革开放使南街村走上了商品生产的康庄大道，并为南街的商品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随着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南街村兴办了敬老院、幼儿园等福利事业，村民们享受的福利待遇也越来越多。不仅面粉、油、电一类生活必需品由集体供给，就连孩子入托、上学的费用也由集体包了下来。职工和村民们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信心更足了。

王洪彬领导南街人富裕了，他在南街村享有了很高的威信。人们说起他来，都会从内心里说出几句赞美的话，介绍几件他的模范事迹。只要说是王洪彬说的话，男女老幼没有不听的。

王洪彬在南街村从不搞特殊，更不搞个人迷信。他经常和群众一起，每天不是到工厂，就是下大田，再不就到敬老院，幼儿园和学校去。不管谁碰见他，都能站着跟他说上一阵子。

王洪彬和他创造的南街村事业有一种神话般的魅力。越来越多的人想认

识他、了解他，每天车如龙，人如流。乔石、朱镕基、张爱萍、王恩茂等中央和省委的领导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并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王洪彬的名声大了，近年来，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还被邀请到中南海和中央党校等地介绍经验。

面对荣誉，一向头脑冷静的王洪彬变得更加冷静。他时时告诫自己，也告诫自己的战友：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漫长而又坎坷，无数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千万麻痹不得，松劲不得，更骄傲不得。

一片忠心报家乡——记张家港市带头人秦振华

——张家港市是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实践的典型；

——张家港人成功地塑造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成为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

——张家港人创造了奇迹，创造了辉煌。

张家港在一夜之间出名了。

奇迹、辉煌都是港城人民群众造。而张家港人会异口同声地加一句：创造张家港奇迹、辉煌的总指挥是我们的秦书记。

秦书记名叫秦振华，1936年生。他高高大大的个头，微微发胖的身体，黝黑的皮肤，粗壮的手脚，宽宽的前额已经谢顶，国字型的脸盘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目光犀利，这目光，大多数人见了亲切，也足以使少数人看了害怕。

1992年1月9日，中共苏州市委任命秦振华同志为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那年他56岁。6天后，秦振华在市委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令人瞩目的奋斗目标——“三超一争”，即工业超过常熟，对外贸易超过吴江，城市建设超过昆山，样样工作争一流。他还提出了“用张家港精神、统一张家港人行动。”

秦振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工业超过常熟？30年历史的张家港市怎能去和3000年历史的常熟市比？看现在的情况，张家港市的工业收入与常熟市比，差了10多个亿。

对外贸易超吴江？吴江是著名的丝绸之乡，中国的山口丝绸，吴江的产品占四分之一。江苏对外贸易“十连冠”不是别人，正是吴江。

城市建设超昆山？昆山有“小上海”之称。5年前，水泥路已沟通所有乡镇，“昆山之路”全省闻名。

张家港市沸腾了，常熟、吴江、昆山市沸腾了，整个江苏沸腾了！

“三超一争”的目标在当年就基本实现了。1992年，张家港市在苏州市“五杯”竞赛中，一举夺得工业、对外贸易、精神文明建设三只金杯，经济总收入在全国百强县评比中名列第四！

张家港人创下的“奇迹”又何止“三超”！

——1992年4月，秦振华决定依靠长江搞保税区，5月拿出方案。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拆迁了1284户农民住房，仅用20个昼夜，就完成了8公里的铁丝网隔离带，仅用150天就建成了60幢20万平方米拆迁户住房，仅用160天就建成了长江流域最大的80万吨级化学工业码头。

——用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使全长33公里，宽70米的张扬公路全线竣工通车，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

这一切，无不体现出秦振华作为港城领头人智慧的目光、超人的胆识。他常说：“小发展大困难，大发展小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秦振华每天早晨 7 点半上班，他上班很少在办公室。开会，接待客商，深入基层；入夜，别人下班了，他还自己办公室上班，批阅文件，安排工作，读书看报，直到深夜才回家。他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从没有星期天、节假日。

1994 年春节，他考虑同事的身体，要求常委、市长们按法定假日休息，而他自己大年三十晚上 7 点半才离开办公室。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 7 点，他又带着秘书出发了。这天，秦振华共跑了 10 个乡镇。3 天假期，他 3 天“泡”在了基层。

即使是出国，出境考察，他也分秒必争。一次他去香港招商引资，上面批了 12 天，他只用了 6 天就回来了。一次去法国、瑞士洽谈项目，上面批了 22 天，他只用了 10 天又回来了。难道美丽的瑞士、繁华的香港、发达的法国还不如张家港迷人吗？他说，不是不想在那些地方多看看，但哪里来的时间？

还有一次秦振华从国外回张家港市，先打电话请 3 位正局长各带一辆车去上海机场接他。也许有人会说秦振华在摆架子，其实“接”是假，一路上秦振华换坐了 3 次车，了解了 3 个局的工作近况。当天晚上，秦振华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会。

“秦书记身在国外，怎么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了解得那么清楚？”常委们惊讶了，没想到秦振华搞了点“小埋伏”。

张家港市以实绩论英雄，这实绩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

个人本事再大，德不行，照样请下。

有一段时间，张家港市赌博回潮。对此，秦振华深恶痛绝，下决心要“杀一儆百”。他请公安部门进行排队，共有 4 个企业的“一把手”有份，其中塘桥镇的一个还是个利税超千万元的厂长。

不少人担心抓了这个“一把手”，企业效益会受影响。办案人员也觉得应考虑这个厂长对企业发展曾作出过贡献，纷纷为他求情，致使秦振华一天收到了 27 封求情信。当天晚上，秦振华通知开常委会，他把 27 封信一一展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发展经济需要各种能人，但不能容忍腐败分子当道。腐败不除，歪风不纠，经济难上。干部心思不放在事业上，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最终还会掉下来。”一班人在统一思想后，秦振华握拳的右手高高举起，往下一挥：“赌博风不刹，经济难上。依法办事，抓！”

常委会后，公安部门立即行动。当夜 12 点之前，把 4 个嗜赌者全部抓了起来，第二天分别带到所在乡镇，在群众大会上宣布。

赌博在张家港市成了“过街老鼠。”

秦振华留给人最初的印象是：勇猛、顽强，有胆量、有魄力，然而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粗中有细，大中有微。

这种细和微构成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这是由他永久的身份——张家港的儿子决定的。他深深眷恋着港城的一草一木，由衷地热爱着港城的人民群

众。秦振华有句名言：“造成环境污染，就是生产黄金的工厂也不要。”这种强烈的环境意识，源于他对人民、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张家港市有 14 家效益好，但有污染的企业被下令关掉，原先的好几个化工厂被他请出城去，禁止拖拉机进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可能会影响城市安静的拘留所、消防队也迁出市中心。这样的事，恐怕在现代都市都难办到，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县级市，推广之难更可想而知。

而更在这之上的，是禁止摩托车入城。当时张家港市摩托车日流量达两万辆，成为很大的一个污染源。但要把这两万辆摩托车“堵”在城外，谈何容易？秦振华下决心“堵”！市委、市政府首先组织各部门的 1450 名干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规定》宣传活动，还将公安部制定的《规定》条文发到每户，每位车主手中。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了千余辆自行车放在几个固定点上，供摩托车主进城租用。然而，还是有人不信“邪”，照样“轰隆，轰隆”窜进城。秦振华从来就是“说了算，定了干”的人，宣传到位，先礼后兵。你硬不听，我就不客气。3 天之内，张家港市收缴闯城摩托车 180 辆，所扣之车 3 个月后再还。

一个成功者，难免会有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秦振华也不例外。但他对此无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中国一位领袖人物也曾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秦振华在张家港的发展历史上已经留下了很深很深的痕迹，张家港市人民记住了他，他们爱戴着创业书记。张家港市黎明小学全体少先队员给秦振华写信，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每当我们在电视荧屏上见到您头发日渐稀少，秃顶在向后延伸，而宽阔的前额下几道皱纹在逐渐加深，怎不令每个有良心的港人心疼呢？”

“秦爷爷，我们深深懂得：你是我市 82 万人民的领头人。您虽已年过半百，但为了新兴港城的崛起，为了人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为了赶超亚洲‘四小龙’，也是为了我们这些孩子们，您带领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大胆的倡导了威震神州的张家港精神，怎不令人钦佩！您身先士卒，日理万机的奔忙，又怎不令人倾倒！然而秦爷爷，您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也得注意身体啊！”

看到这里，秦振华这位铮铮硬汉落泪了，他感到的是由衷的满足。

死厂在救星手里复生——柴油机生产专家吴景春

听说吴景春辞职了，我的心实实在在地忽悠了一下：出啥事呢？

我和吴景春的交往也有六、七年了，他以前的情况，我是了解的。

那是 1988 年，朝阳柴油机厂极度危难的时候，全厂 5000 多号人把碗里的粥底都舔光了，眼看手捧空碗饿肚子。吵吵着要调走的，旷工的，请长假的，报不了差旅费混骂的……整个厂如同一座倾斜的大厦，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平衡。

怎么办？

这是朝柴人人想着的问题，又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情况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订货量还不足正常生产任务的三分之一，这预示着工厂将关门倒闭……

厂长调走了，谁来接这个烂摊子，往这火坑里跳，有的人想到了吴景春，说他行。文革前的工学院毕业生，在朝柴干了二十几年，当过技术科长、设计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还是个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柴油机生产专家。有人说他不行，慈眉善目的，活脱脱一个“笑佛”，如何能整治得了这么个大烂摊子！

出乎意料，吴景春还真的愿意跳这个“火坑”。厂职代会来了个投票表决，百分之九十七的人认为这个厂长由他来当最合适。

吴景春不是“假大空”的人，他对朝柴的一草一木有着特殊的感情，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他了解朝柴，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他对朝柴倾注了全部心血。

吴景春在锦州工学院读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干部，入了党，各学科的成绩都很优秀。作为高才生，1964 年他被分配到辽宁省农机工业公司，身在省城的吴景春却总是眷恋着家乡那片故土。他的家乡是老区，可老区还是老样子。他不忍心，他要求调到了朝阳。他不愿丢掉自己的机械制造专业，又要求来到了朝阳农机厂。当时的农机厂，只有 300 多名职工，一个小破院，几栋小平房，他不嫌弃。主要产品是农用动力机械和各种三轮拖拉机，他要改造这些落后的产品。一份份图纸从他手中设计出来，一个个新产品生产出来。厂里看他是块料，提拔他当工艺科科长，负责全厂的技术改造。吴景春雄心勃勃，领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到上海搞技改。有人要单独给他安排一间屋，他不让，非要和大家住在一起不可。回来买票难，他通宵到火车站去排队。到河南搞拖拉机试验，他开着他的“作品”，一气跑到河南。农村很艰苦，他和同去人员一起住在老百姓家。吴景春把科技人员当宝贝，在工作上信任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们尊敬他，佩服他，愿意围着他转，服从他的领导。科技人员发挥了作用，主要产品柴油机从 6102 型发展到了 6102B 型；从 4102B 型发展到 4102Q 型，4102BQ 型，农机厂变成了柴油机厂，小平房变成了大厂房，人员增加到几千人。

当上了厂长的吴景春，首先考虑到的是 5000 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他当企业的头，得对得起和他一起一步步走过来的兄弟姐妹，不能让他们跟自己大富大贵，可也不能让他们跟自己没粥喝受洋罪。厂子不能在自己手里大红大火，可也不能败在自己手里。就为这个，他靠内力，借外力，激活力，增实力来救企业。他以市场带管理，向管理要质量，靠质量求效益，用效益促发展。他和班子成员一起，苦心谋划，走出了一步步好棋；实行企业内部承包，目标分解；划小核算单位，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狠抓技术改造，大力开发新产品；严把质量关，扩大横向联合……他还突击抓销售，成立了销售开发部和配件销售公司，给销售部门增加了几十员懂技术会经营的干将，把他们推向全国，让他们冲向各个市场。

接着，吴景春把 36 个科室合并成 24 个科室，减少了扯皮，提高了效率。对干部全部实行招聘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一下子，全厂活了起来。

看到汽车市场出现转机，职工生产热情不断高涨的吴景春，在班子会上谈了自己的意见：“现在我们大干快上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应修改生产计划，把月产量增加到 1300 台！”吴景春的几句话，把一些人弄愣了。有的问吴景春：“一下子增加 800 台，能行吗？”他觉得同志们的意见有道理，计划变动这么大、是得听听职工们的意见。

221 份征求意见书发下去了，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月产增加 800 台的计划可行。

没有质量保证的数量是靠不住的。吴景春怕提高产量影响质量，率领全厂技术人员解决了 30 多个项目的质量问题，摘掉了朝柴人戴了多年的柴油机“小毛病综合症”的帽子，攻克缸体、缸盖的质量难关。

一年下来，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横的竖的又增加了不少，微胖的体型也变得苗条起来；可换来的是朝柴历史上没有过的满堂彩：产值 1.1 亿元，利税 1600 万元，均高出承包基数 4 倍多。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创历史最高水平，产量质量都居全国同行业领先地位。

天下火，地流水。车间如同一个大蒸笼，工人在里面如同洗桑拿浴。男职工都光着膀子，个个后背上滚动着油汪汪的汗珠。女职工的背后都湿了一大片，衣服紧紧地贴在肉皮上。

吴景春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回到办公室，他下令给每名职工增发 100 元高温生产奖。

一位在朝柴干了 30 多年的老人接过奖金，用颤抖的声音说：“厂长知道咱们的苦处，拿咱当人看哪！”

吴景春曾搞出大小技术成果几十项，6102Q 型柴油机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三等奖，6120BQ 型柴油机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二等奖，6102A 型柴油机获辽宁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9 年，朝柴干部职工一致推荐吴景春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级有关部门也点名让推荐吴景春，吴景春却说啥不同意。他说：“怎

么一有好事就先考虑领导呢！企业的成绩是靠工人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换来的，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应推荐一名工人代表。”他硬是上报了有突出贡献的一名工人代表张德元。

工人都是有良心的，他们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儿。领导心里有他们，他们心里就有领导；领导拿他们当人看，他们就把企业当家看。职工的行为，往往是领导行为的一面镜子。

正当吴景春率领朝柴人大干快上的时候，原材料猛涨价，产品不让涨价。这个局势不是吴景春能扭转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靠提高生产力水平，来保住原来的成本。吴景春的苦处，职工心里清楚。一伙伙工人来到吴景春家，这个说是厂长别犯愁，没有蹚不过去的河，没有翻不过去的山，我们多出把力，多流点儿汗，两天的活儿一天完就都有了。那个说吴厂长，原材料涨价点没啥大不了的，我们干活都过点儿细，少出点废品不就结了。望着一个个离去的工人，一向笑呵呵的吴景春眼睛湿润了：“多好的工人啊！有了他们，啥困难克服不了啊！”

工人们拼上了，他们要用汗水把原材料涨价的钱补回来。可是刚大干起来没多久，铸造车间的冲天炉又出了问题，这里是朝柴生产的第一道工序，这里出了毛病，将影响各工序的生产。吴景春赶到了铸造车间，冲天炉的铁水正从炉底往外喷，如不及时堵住，造成过桥堵塞，就会终止生产。吴景春着急了，但他又不能命令工人去堵，因为那太危险了。可工人张德元抢在前面，冲上去弯腰仰面用黄泥去堵，一次不行，两次还不行……危险真的出现了，张德元的一只脚踏进铁水里，铁水钻进鞋里，烫得他钻心般疼痛，他强忍着把炉底堵上。这时前炉又突然跑火，鲜红的铁水喷射而出，落在地上溅成无数朵金花。面对 1400 多度的铁水，张德元拖着烫伤的脚，又第一个冲到炉前，工人们也跟着他冲了上来。铁水如火蛇，人们七手八脚一起往上堆黄泥，到底堵住了跑火的炉口。

在这里工作的工人，常年在五六十度的高温下生产，嘴上常年捂着大口罩。夏天穿着裤衩干，炉火铁水能把人烤出油来。这且不说，每天还要吸进足能导致矽肺病的各种有害物质。吴景春在这里还看到一堆堆劈好的生铁，心想：“劈这么多生铁几十个临时工也难以完成，而铸造车间又从来没用过临时工。”车间主任告诉他说，这都是工人们利用班前班后的业余时间劈出来的。

第二天，吴景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方案，决定改造铸造车间。他拿出 9000 万元资金，建成了我国最先进的铸造生产线。宽敞的大车间锃明敞亮，全部自动化。长期在噪音中工作的工人，有的听力减退，有的耳鸣，有的头昏，也有的心脏出现了问题。“抓紧改造装配车间，把工人从噪音中解救出来！”吴景春在心里告诫着自己。很快，200 多米的国内先进的装配线出现在工人面前。工人在试车室外，隔着玻璃按电钮操作，再不受震动和噪音之苦了。

进入 1993 年，朝柴的生产销售形式越来越好，月生产 3000 台，月盈利高达 500 多万元。

吴景春没有陶醉在成功之中，他要乘势大干一场。在全厂干部会议上，吴景春说：“要让朝柴人不但比过去生活得好，还要比别的企业的职工生活得好，出路只有一条，加入汽车集团，走联合的路！只满足能开开支，能发奖金，那是桌子底下放风筝——起点太低了。应找准时机，高起点，快发展。”吴景春的话不多，声音不大，却震动了会场的每个角落。

吴景春瞄上了东风汽车公司，他要搭上这班车，这个说三，那个道四，吴景春却想，这样对国家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地方有好处，对朝柴职工有好处，何乐而不为？现在企业生产销售形势好，是最好的联合时机。地方党委政府领导人英明，坚决支持吴景春走联合的路。

吴景春是 1994 年 1 月 2 日辞职到总装厂，总厂的一切工作由常务副厂长负责。

吴景春决定从总厂到分厂，从处室到车间，一把手全部上质量第一线。质量工作全部由一把手管，让管技术工作的只管技术进步和技术开发。

朝柴的产量、质量矛盾都集中到总装分厂。总装厂的质量问题解决了，全厂的质量问题也就解决了。因为柴油机的所有部件最后都拿到总装厂来组装，在这里，可以发现全厂各个工作部门的质量问题，吴景春蹲在总装厂，有谁愿意让他发现自己工作中的问题呢？因为发现问题要受处罚的！各部门一看动了真格的了，都认真起来。吴景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组织了质量服务组，让企业 7 个主要处室工作人员下到总装厂调查自己部门的问题。仅用 10 天时间，就找出质量问题 128 个，当时就解决了 102 个。

吴景春把我送出车间，正巧遇上了从外面匆匆赶回来的吴景春，他笑着问我：“你也知道我辞职了？”我笑笑说：“社会上说啥的都有，刚才我的老同学给我说清楚了。”吴景春点点头说：“噢，下星期我就回总厂办公。从二季度开始，全厂划出质量责任区，我还分抓总装厂。”

新时代的时传祥——公厕掏粪工梁开全

在宜昌，一位公厕掏粪工，最近获得崇高的荣誉。去年12月7日，宜昌市委书记罗清泉在市直干部大会上，动情地号召全市400万干部群众要以他为榜样，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共图宜昌二次振兴。

他叫梁开全，宜昌城区现今唯一的掏粪工，负责城区50多座公厕的清掏除渣。13年来，他清掏的粪渣10吨大卡车要装800多车。

俗话说，三十而立，这个“立”字，在许多青年人眼中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而13年前，年近30岁的梁开全却推着粪车，拿着钉耙，干了掏粪渣的行当。

从上班的那天起，苦、累、脏、臭，还有世俗的蔑视，所有的艰难就一直横在他的面前，梁开全这位1.8米的大个子，没有退却。他的道理很简单：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科学怎样发达，高楼大厦多么漂亮，厕所总得要有人来掏。

按照惯例，每座厕所每年清掏一两次就够了，但随着居民和流动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塑料袋等新的生活垃圾的增多，使得每年清掏次数增加到5—6次，工作量陡然增加几倍。

有时上百个塑料袋和着铁丝、玻璃等死死地搅在一起，把粪池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钉耙无济于事了，他就挽起袖子，用手一块一块地往外抠，常常抠得双手鲜血直流，刺痛难忍。他那一双粗黑的大手，常常是又红又肿，伤痕累累，被胶布裹缠着。

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也无论上班，还是休息，只要听说有粪池堵塞，影响居民生活，他都毫不犹豫地赶去。1991年除夕，天降大雪。上午他正和家人准备着团圆的午饭，突然有人告诉他，23号公厕粪水四溢，四周居民叫苦连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二话没说，拿起工具就消失在纷飞的雪花之中。

为了清掏方便，他脱掉棉衣，穿上冰凉僵硬的橡胶防水服。一次又一次地地下到粪池，一点一点地掏出家禽的毛皮、内脏、骨头、鱼刺等堵塞物。街上的鞭炮一阵紧似一阵地响着，四周音响和电视传来热闹的声音……等他掏完最后一堆垃圾，带着满身污物爬出粪池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多年来，掏粪工来来去去换了百多个，唯独他始终坚守着这个岗位。

好几次，好心的人劝他：凭你的个头，你的力气，你的勤劳，在哪里不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总是憨憨地笑着：“我看这工作挺好，再说这项工作离不开我。”

在他看来，公厕掏粪工不但不低贱而且很重要，要不然，1993年市里为什么授予他“城市美容师”的光荣称号呢？去年，宜昌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书记市长又是发号召，又是亲自参加劳动。可见，要把宜昌建成一流的城市，少不了清洁工，也少不了掏粪工。越是没人干，越是少不了。

正是这份爱，使他成为宜昌有名的“公厕通”。无论哪个粪池，别人掏不通，他能掏通。有一次，一座公厕的小便池堵塞，几个临时工用一丈多长的竹片捣了3天也没有效果，末了他们请来“梁师傅”，他只用一米长的竹片捣了几下，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一次，几个临时工为清除一个公厕的粪渣，对邻近的几个下水道井盖反复琢磨了好久，仍难以确定到底哪个通往粪池。梁开全一到，指着其中一个，肯定地说：“就是它。”临时工们撬开一看，果然不错。

梁开全不是歌星、舞星，不是“大款”“大腕”，但却是居民心中的“名人”。尤其是公厕附近的一些老爷爷，老太太，见到他，都亲切地叫他“全儿”。厕所出了问题，他们会说：“只要把‘全儿’请来就行了。”等他完活，他们会端来盛着清水的脸盆，递上肥皂和毛巾；冬天，请他喝碗热茶，暖暖身子；夏天，送他一杯凉茶，消暑解渴。

梁开全对这感慨万千，无论是谁，无论干什么工作，只要于人民有益，这人活着就有价值。厂长经理给社会带来财富，受人尊敬；歌星、舞星给人们带来欢乐，受人崇拜；掏粪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文明环境，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样有价值，也同样可以博得人们的尊重。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样想。几年前，就有人曾不怀好意地劝他：“你干这个，辛辛苦苦一个月才200来块钱，还不如去抢来钱快。”

是啊，梁开全收入低，缺钱花，两口子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不足600元，至今还住在紧靠公厕的一个工棚里。因为交不起城市增容费，虽然已工作了这么多年，但仍是农村户口，转户口的事想都不敢想。

他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

1994年春天，他花几个小时帮一个小伙子从粪池里捞起丢掉的7000元现金，小伙子从中抽出一叠钱表示谢意，他坚决不收。

一天深夜，他去一个公厕关水龙头时，发现墙脚有一个口袋，一看，里面装着10多件皮上衣，他立即交给了正在巡逻的警察。

就在前不久，他在清掏粪池时，一个黑皮包出现在他的眼前。拉开拉锁，里面装着一部“大哥大”，他迅速交给单位，等待失主前来认领。

在他的心中，粪渣虽脏，但小偷小摸，发不义之财的社会渣滓的灵魂更加肮脏。对那些奸邪之徒、丑恶现象，他恨之入骨。

粪池常常被犯罪分子用来销毁证据，每当公安部门需要在公厕寻找罪证，他总是积极配合。

11年前，公安部门在侦破一个案件时，因缺少一条小孩的裤子作罪证，罪犯坚决不招供。梁开全知道后，在可能丢弃裤子的几个粪池里清掏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找到了关键的证据，罪犯被绳之以法。

梁开全读书不多，但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新时代的工人，他记得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一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

益于人民的人。”他还记得 60 年代的掏粪工时传祥，他不仅要以时传祥为榜样“宁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他还要以“爱岗敬业作奉献，灯红酒绿不动心”的精神，做一个新时代的时传祥。

十九点钟的太阳——全国劳模、房修水电工徐虎

在上海西北部的中山甘泉街道居民区内，挂着3只小木箱。10年过去了，无数次的风雨已在小木箱上留下斑斑旧迹。小木箱上的油漆字已经变得模糊，一把小铁锁换了又换。但就是这几只破旧的小木箱上，寄托着一个共产党员“时刻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反映着一个十年如一日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成为小巷内一条光亮的风景线。

这3只木箱是“夜间义务报修箱”。它们的主人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但这位普通的劳动者却用他平凡的劳动，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这位劳动者名叫徐虎，他是一名房修水电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徐虎中等偏矮的个子，戴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作为一名水电工，他的工作就是修一修损坏的电线，捅捅被堵住的马桶，或者检查一下屋顶的水箱。尽管这些活又脏又累，但这项平凡的工作使他被评为社会服务工作者一等奖。

一天上午，一位中年妇女急匆匆地拉住徐虎的手嚷着：“昨晚上6点钟，我家所在的楼层突然断电，几家人家一片漆黑。冰箱不能用，孩子复习迎考只能点蜡烛，真是急死我了。今天早晨我是请假来的。”听着听着，徐虎的脸红了，“这属于我管理的范围啊，大多家庭都没人在家，向我报告情况还得请假。这算什么优质服务呢？”

从此，他天天在想怎样更好的为别人服务。一天晚上，他严肃地问妻子：“你说，居民什么时候最需要服务？”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看是晚上，这时候水电使用量最大，最容易出故障，居民们也都在家。对了，我要实行夜间服务。”

1985年6月23日，徐虎和他的家人在自己所管的范围内挂了3只木箱，上面用红漆写着：“凡附近公房居民遇到房间水电急修，请写清地址，请将纸条投到箱内，我将愿意为你提供服务。每天开箱时间：19时。徐虎。”

19点，夜晚的黄金时间。当别人都坐在电视机前时，徐虎却开始干自己的工作。每天晚上，人们都可以看见徐虎背着工具包，匆匆地在街上走动。工作了一天的他，还没有从劳累中缓过气来，又开始了夜晚的义务劳动。他没有给自己安排星期天、节假日。无论下雨下雪，他都没有失去过信用，只要哪儿需要帮助，他就一定会赶到哪儿去。

1992年冬天，一场特大的寒潮侵袭了上海，好多自来水管都爆裂了，住宅楼里都断了水。就在这个时候，徐虎却病倒了。高烧到39度，一整天只喝了几口米汤。他躺在床上，昏睡着。突然，他一下子掀开被窝爬了起来。老母亲一看钟，正是7点钟到了，她硬是把徐虎按回了床，哭着说：“虎子，听妈的话，今天就让别人代你吧。”

可是徐虎知道这种时候怎么能抽出人来代他呢？他恳求地对娘说：“妈，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这个时候居民需要我啊！我怎么能不守信用

呢？”他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出了门。直到这时，他的老母亲才明白了自己的儿子。

就是过年的时候，徐虎也不能和全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他总是说：“越是过节的时候，老百姓就越需要服务。”7点，徐虎还是上门服务，直到深夜才回到了家。

1988年除夕，徐虎开箱后没看见一张纸条，这是一个难得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他和家人一起包着饺子，准备全家欢欢喜喜吃一顿年夜饭，他的女儿十分高兴地和爸爸约定“十二点钟一起放鞭炮”。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有一栋楼同时断水，居民十分着急。徐虎二话没说，在寒风中走出了家门。

新年的鞭炮声响了起来，徐虎的女儿提着那“八百响”的鞭炮站在家门口，眼里含着泪水。过了好久，夜已悄悄地平静了，徐虎才回来，他把女儿带到阳台上，和女儿一起点燃了鞭炮。鞭炮声中，他和女儿一起笑了。

徐虎知道自己的劳动很平凡，但他也知道自己平凡的工作对老百姓十分重要。他说：“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了，那么老百姓还会有什么怨言呢？”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他明白自己的工作不仅代表了自己，还代表着党的形象。

10年过去了，徐虎却从没因岁月的漫长而疏忽了自己的工作。10年来，他累计一共开箱3718天，义务修理2146个项目。他既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也没忘记义务为人民服务。他服务的项目除了维修，排除故障外，还起到了调节百姓之间关系的作用，融洽着邻里之情。

一次，楼上和楼下的两户居民为了卫生间漏水问题吵了起来，后经居委会多次调解都不见效。徐虎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免费为楼上的居民修理了有问题的浴缸，后来他又自己掏钱修理了损坏的装置。漏水问题解决了，楼上楼下两户居民也握手言和了。居委会评价徐虎是：“不仅修了漏，还治了心。”

从这些事中，徐虎更是感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他下决心要努力坚持不懈为百姓服务，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树新风。

一天傍晚，徐虎习惯地打开了他的小木箱，发现里面有一张纸条，这不是一张报修单。“徐师傅，我们地区有了您，这是我们地区群众的幸运。您辛苦啦，谢谢您。”徐虎感到全身暖烘烘的。自己的工作能为人所理解，被人承认，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而徐虎所管区的居民简直对他产生了依恋。

有一位退休职工，好不容易分到了一间大的房子。可是等他搬家时，他却拒绝搬迁。“只要徐虎在，我就不走了。”他舍不得这个地区的徐虎。徐虎以自己的优质服务，换回了社会的信任与良好的信誉。

在这个“金钱万能”的时代，许多人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在徐虎的信誉不断提高后，有人劝他到附近一家公司去工作，每月2000元的工资。徐虎说：“我走了，居民家中的水电急修怎么办！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光想着赚

钱。要多想着群众，多想着做为一个党员的职责。”

徐虎有一句格言是“我们干我们的”，面对钱的诱惑，他丝毫不动心。尽管他家也等着为女儿买一套音响，他的生活条件还需改善。在他的桌子下压着这样一句话：“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小人之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博大的胸襟。他心中装的从来就不是自己，而是如何为别人。他不是想向社会索取什么，他以自己平凡的工作，向社会奉献着自己的爱。我们的生活不论发生多大的变化，奉献社会之心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丢。

“辛苦我一个，方便千万家”。徐虎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相向徐虎学习。“徐虎效应”、“徐虎第二”、“徐虎第三”次第出现。徐虎不仅实现了他的人生信条，而且成了我们大家学习的模范。只要我们能努力为人民着想，我们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我们的工作多么平凡，我们终究能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有意义的。

给你一个临时的家——优秀售票员李素丽的故事

“各位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我们21路1333号车。您可能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我将用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为您提供周到的服务。途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请不要客气，我会热心帮助您。”从扩音器里传来李素丽的声音，汽车启动了。

李素丽是这路车上的售票员，整整15年了，她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岗位上用真诚的笑脸，用热情的话语，给无数的旅客营造了一方小小的家。

李素丽说：“我为我的职业，我的岗位自豪，是它给了我每天都能向他们奉献真情的机会，让我每一天都感到充实。”是的，自从15年前，她以12分之差没考上大学时起，她就开始了她的售票员生活。父亲开了一辈子的公共汽车，对她进行最深刻的职业教育。在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她渐渐地热爱起当售票员这一行，这种热情就一直没有减退过。

她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是首都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首都形象，自己服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首都的声誉。“对内我代表首都，对外我代表中国。”她一心要让到北京的人们从一开始就享受到北京人的美好服务。

李素丽有自己的服务原则“礼貌待客要热心，照顾乘客要细心，帮助乘客要诚心，热情服务要恒心”。她也有自己的服务要求“多说一句，多看一眼，多帮一把，多走一步；话到、眼到、手到、腿到、情到、神到”。在她的车上，几乎所有的细节，所有旅客可能发生的问题她都想好了对策。

车上设有方便袋，这是供晕车想吐的人用的；车上备有报刊杂志，这是遇上堵车让乘客解闷的；还有“创可贴”，还有专为抱孩子的乘客准备的小棉垫。如此无微不至的服务，谁都会感到家的温馨。

同时，在为乘客服务的时候，李素丽也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如果我能把这10米车厢、3尺票台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实实在在去为社会作贡献，就能在服务中融入真情，为社会多增添一份美好。即使有时自己有点烦心事，只要一上车，一见到乘客，就不烦了。”

想当初李素丽刚当售票员不久，一天查票时，一个小伙子把票举到她眼前晃着，嘴里嚷道：“你看，你看，让你看个够！”李素丽气得直哭。她明白了尽管售票员工作十分平凡，但并不简单，需不断地学习努力。

渐渐的，她学会了将常见旅客进行分类服务：学生需要提醒他们维护秩序；老幼病人需要细心搀扶；陌生人需要“百问不厌；”“上班族”需要耐心等待……为更好接待外宾，她自觉学习英语；为更好为聋哑人服务，她又学会了常用哑语……对于一个售票员来说，她尽力做到抓紧时机学习一切业务知识，并尽力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1993年，她考取了北京市市委党校大专班，利用业余时间学完了19门课程。

她掌握了顾客的心理，揣摩着各种服务用语，尽力让乘客能保持好的心情。遇到孕妇乘车，李素丽不是在扩音器里大声嚷着：“谁给这位怀孕的同志让位？”而常常悄悄提醒孕妇身旁座位上的乘客。她知道，自己每一句话

都可能伤及别人的自尊心。

李素丽说：“用力去做只能达到称职，用心去做才能达到优秀。普通平凡的事情要往好里去做，是没有止境的。”她使我们明白了做任何一件事情光有热情，只是热爱是不够的，要永无止境地去学习各种知识。

一个小小的车厢内同样是一个世界，各种事情都可能碰到，各种人都有。李素丽凭她过硬的业务知识，对工作无限的热心，巧妙地处理各种事件。难怪有人说，无论车外天晴下雨，盛夏还是严冬，车内永远是明媚的春天。

一次，一个带小孩的妇女来到了车上。李素丽动员一个姑娘给她们让了位。那个抱小孩的妇女坐下了，谢谢也没说一声，让位的姑娘脸也有些难看了。李素丽逗小孩说：“这位阿姨这么热还给你让座，快谢谢阿姨。”那位妇女马上回过神来，说了声：“谢谢你。”这下，两个人都高兴了。

还有一次，李素丽查验下车旅客的票，一个小伙子掏遍了全身，还是没找出票来。李素丽知道他没买票，说：“您的票可能是丢了吧。要不，您今天再买一张。等下次找到了，再坐车就不用买票了。”小伙子脸红了，掏出两元钱说：“大姐，我刚才没买票，您说怎样罚就怎样罚我吧。”李素丽说：“要逃票了才罚，您及时补票就行了。下次上车要主动买票，就不会再耽误您的时间了。”

李素丽说：“人人都有自尊心，售票员不能得理不让人。让乘客下台阶，我的服务就上了台阶。”

对待一些不讲理的乘客，李素丽同样有办法。一次，一个小伙子在干干净净的车厢内吐了口痰，李素丽轻声提醒他不要随地吐痰。没想到小伙子又吐了一口，李素丽没说什么，掏出纸把地板上的痰迹擦净了。在全车的注视下，小伙子脸红了，下车时连声道歉：“刚才全是我不对，请大姐原谅。”

李素丽以她的热心周到的服务，得到了广大乘客的赞扬和理解。

一次，有位白发大妈拎起菜篮子从行驶着的车上站起来，李素丽说：“大娘您不用忙，到站后我扶您下车。”“你的服务真好！”白头大妈激动的说，“大家为这位售票员鼓鼓掌！”

话音刚落，车内掌声四起，李素丽感动得热泪盈眶。

售票员的岗位虽然平凡，但李素丽热爱自己的岗位，她也得到了乘客们的热爱；她献给乘客的是真情，也得到了乘客真情的回报。

有位盲人下车前把一个纸包交给李素丽：“我特爱听你报站和宣传。这几天，我觉得你嗓音有点哑，给你买了一包中药‘胖大海’，你泡水喝吧。”

一位中年女乘客拉住李素丽：“你太累了，我看你脸色不好，可要注意身体啊！”说罢，把一把荔枝放到售票台上，下车了。

更让李素丽感动的，是一些接受过她服务的乘客以她为榜样，也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真情。崇文区第二人民医院保健科杨秀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秀敏坐了李素丽 10 年的车，李素丽的服务态度深深感染了她。孩子大都哭着不肯打预防针，她就自己做了不少玩具，一边让孩子们玩，分散孩

子们的注意力，一边给孩子们打针。有些父母白天上班没空带孩子到医院体检，她就上门服务。

一天，李素丽服务的车快到终点站时，她发现座位蜷缩着一个因肚子疼而大汗淋漓的小学生，随后，她便把小学生带到车队细心照料。后来，小学生的疼痛缓解了，李素丽又和司机一起把小学生送回家。暑假时，这名小学生和几个小伙伴来到车队，要帮阿姨擦车。后来，他又组织了一个红领巾学雷锋小组，每天帮街坊的爷爷奶奶往楼上拎东西，整整干了一个暑假。

李素丽的工作岗位是平凡的，但她却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成绩。她本人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的表扬，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售票员”，“五一劳动奖章”和“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面对乘客的关心和社会的肯定，李素丽说：“我说不清楚是我奉献给他人的多，还是他人奉献给我的多。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我在售票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我永远属于我的乘客，一属于我的岗位；我的服务能使乘客满意，胜过任何荣誉。”

面对荣誉，李素丽也表现得很平静。她依然保持着她的热情，把汗水洒在车上。“每一条公共汽车的线路都有终点站，但为人民服务没有终点站，我会永远用自己的真情和奉献同大家一起走向明天！”

在山乡播撒希望的种子——全国优秀教师赵诗德

9月1日，新学年的钟声敲响了，天门市李场职业高级中学校长赵诗德站在校园中望着拔地而起的新教学楼、实验楼、住宅楼，心里激动不已。

10年前的这天，普通学校已开学，他却还在为职业高中的户口、校舍、教师和生源奔波。

如今，李场职中已拥有几千万元的资金，各类设施应有尽有，常年在校学生600余人。年初，镇里又作出决定，把学校现有的面积从110亩扩大到500亩，兴办良种场、林果园、养殖场等实验示范场……走过了10年的风风雨雨，学校的发展如日中天，赵诗德怎能不激动？

李场乡过去是一个穷山乡，“荒山秃岭黄土坡，几间土屋缀山窝”。10年前，全乡万亩荒山荒水年复一年无人问津，人均收入还不到200元。

山乡的出路在哪里？1986年8月，原任李场乡教育组会计赵诗德站了出来，向教育组、乡党委和乡政府请示：创办一所农村职业高中！他不停地跑市里，跑乡里，讲农民头脑里怎样的缺少科技“脑黄金”和穷山乡需要办职中的道理。终于有了个说法：你自己找几个教师办着试试看。

当时职业教育在全国处于初创阶段，社会上人们不支持，不理解，教师们把教职中看作是遭淘汰，靠边站，没出息。赵诗德却执著的捧着一张白纸去办职中。

赵诗德决心创办职中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曾利用节假日跑遍了全乡，对全乡的初中毕业生进行了追踪调查。赵诗德发现，在普通教育“千军万马挤过升学独木桥”的路上，大部分学生与高等学府无缘。而这些名落孙山的学生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升学考试上，升学考试失败了就灰心丧气。

赵诗德发誓向旧的习惯和势力发起挑战，他把在这个穷山乡里创办一所高标准的农村职业中学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要为山乡脱贫致富播下智慧的种子，点燃希望之火。

然而，要在这个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之乡”创办一所农村职业高中是何等艰难啊！何况，一切起点都几乎为零。

没有校舍，他向泉堰村借了两栋闲置的旧房子，自己动手进行改造。他“三顾茅庐”请教师，把自己家里仅有的600元积蓄拿出来作经费。

最难的还是生源问题。当时，“跳农门”之风盛行，山民们盼望自己的孩子升学一步踏入“天堂”，一听说读了职业中学毕业还是回到农村，任赵诗德磨破嘴皮，还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面对这种情况，赵诗德和6名青年教师不泄气。他们头顶骄阳，爬山岗，走丘陵，遍访了全乡23个村，2000个村民小组。

老赵了解到，周黎村有个学生初中毕业回家后，父母为了让他有用武之地，送他上嵩山少林寺学武去了。赵诗德先后8次前往做说服工作。一天晚上天下着雨，赵诗德又来了，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掏给这一家人：“李场有的

是山，有的是水，缺的是人才，不是武术。让娃子上了职中，拿了金钥匙，穷山门就打开了。”终于，这个学生告别嵩山少林寺走进了李场职业高中。

1986年10月6日，首届35名学生被赵诗德和他的“青年志愿者”请进了学堂。

在忙完开学典礼之后的当天晚上，赵诗德就病倒了。那名嵩山学武的学生走进医院，望着赵诗德苍白憔悴的脸说：“您是为我们累病的，我一定在这里学好本领，回去干一番事业来，为李场职中争光。”

办职业中学难，要办好农村职业中学更难。赵诗德深深知道，办学的社会效果是农村职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赵诗德决定教学面向农村，面向用人单位。在开设种植业、养殖专业课的同时，新开办了宾馆服务，礼仪、实用英语、财会等专业课。为了给培训出来的学生找到就业门路，赵诗德和老师定期到沿海考察人才市场，走联合办学之路。他们西上重庆，南下广州、深圳，直接与用人单位签约，按需要培养人才。

现在，学校已纳入中国职业教育大系统中，是中国西北职业教育中——北方人才工程的试点单位，同时又是中国南方办学集团——金凤凰办学集团成员之一。

学生就业后，赵诗德没有撒手不管，对农村学生建立了“跟踪管理卡”；对到沿海就业的学生，学校对需求方进行过细致考察，学生上岗后由学校派出教师跟踪驻厂协助管理服务一年，既保护了学生合法权益，还受到了国内外商家的欢迎。

从学校走出去的800多名学生无一人上当受骗，先后有20名学生被用人单位派往异国学习深造。

10年来，李场职中面向农业开设了林果、养殖、机电等专业，推广了42项实用技术，培养农民技术人员1854人。在1400名毕业生中有65名升入大专院校深造，大多数人成为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一只只金凤凰飞出李场乡。李场职中被列为全市重点学校，先后被评为市先进学校，被市树立为职业教育的一面红旗。赵诗德1994年荣获“湖北省董必武基金科技兴农奖”。前不久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市“特等劳模”。

山魂——护林员张炳润

许多人有着美好人生，一生也许会留下张张永驻青春的情影。

然而，八旬老人张炳润守护山林 36 年，身后留下的是一片绿荫，当他因公殉职时，却赢得了人们以热泪和敬意编织起来的 36 个花圈。

新年元旦这天，中午 12 时 10 分，正在大悟县城关镇西大山林区巡护山林的 82 岁老人张炳润和易良道、易忠和、李志国、张友良 5 名护林员发现林场西南广水冷棚岗流沙河林区方向浓烟滚滚，烈火乘风向东北席卷而来，西大山林场 2000 多亩中幼林受到严重威胁。

情势万分紧急！张炳润凭着 36 年的经验，马上安排人到附近村子喊人救火，打电话到镇里要求组织力量前往扑火，剩下的人则迅速投入到一条 500 多米长的火龙带边，奋力阻止火势蔓延。

数月干旱，使这场山火如脱缰野马，风助火威吞噬着林木，也舔噬着扑火的张炳润。他的头发烤焦了，衣服烧着了……到了下午，镇里领导带领增援人员赶到火场时，只见张老的棉衣裤已被烧尽，全身只剩下一块焦布，他躺在地上，双手还紧握打火棍。镇长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将张老送往县医院抢救。诊断结果是头、躯干、四肢火焰重烧伤 60%，2—3 度，已是面目全非。

张炳润醒后，第一句话就问：“山上烧了多少？”还说：“我老了，不要花钱诊了，我死了值得。”

元月 2 日 6 时 10 分，张炳润老人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的人员赶到医院，用他们手中的相机，含泪给老人拍下了他有生以来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张照片……

张炳润从 1958 年起就服从组织安排，由村农会主任改当村办林场护林员、场长，后来到镇办林场当护林员至今。36 个寒暑，36 个奋斗人生。西大山林场先搞用材林，后栽经济林，他亲自经营的用材林，先后为国家提供 600 多立方米木材，创产值 30 余万元。

张炳润的老伴 1987 年病逝，临终前拉着张老的手叮嘱说：“你已是黄土齐胸的人了，以后跟着儿女过，莫再去守那孤山了，山上苦哇……”张老含泪点点头。可是，刚把老伴的后事办完，他的大儿子又接着病逝。人生两个悲事接踵而至，给了张老以沉痛打击。可他最终并没趴下，吞下泪水，还是扛着行李上了山。1991 年，为了把镇里投资 9000 元建立两个护林点的事办好，他与年轻的护林员一起劈山石、垒围墙，用满手的血泡换来了 6 间大屋；当年还养了一群羊，6 头牛、2 头猪。每日清晨，张炳润 5 点钟准时起床，站在高处观察山林；住处无电无水，他坚持挑水上山，用仅有的一部半导体收音机获取山外信息，了解天下大事。

西大山林场是城关镇最大的林业基地，也是全县人均建设一亩高效经济林的示范点，担负着育苗供苗的重任。张炳润是林场技术总指导，一心扑在精细育苗上；此外，林场还是镇两个文明建设的劳动基地，每当节假日，青

年人上山劳动，张老总是手把手地指导挖山抽槽、施底肥。据统计自 1991 年以来，经他亲手栽种的马尾松就有 2 万多株。

护林时，张老从不讲情面讲感情。他的儿子大忙季节没时间管牛，要老人代看半天，张老说：“西大山的草不是牛吃的。”一句话给顶了回去。双河村老党支部书记退职后，想放着牛跟张老聊天，张老捎话说：“老书记到山上来玩可以，还有酒喝，但牛必须在 3 里之外的山边拴着！”弄得老书记哭笑不得。

有人说：没有张炳润，就没有西大山林场；也有人说，不怕山穷土瘦，就怕人不真干。张炳润与大山打了一辈子交道，认准了一个道理：万物山中生。林场三条冷水沟散布着 6 亩稻田，就是张炳润和 4 名护林员自耕自食自足的粮仓。5 人还进行了收成比赛，1995 年，这 6 亩冷浸田还获得亩产 450 公斤的好收成。

西大山树木葱茏，绿色的丰碑中凝聚着忠诚的山魂。1994 年，省林业联防办公室授予西大山林场为先进单位。一切荣誉已过去，“山魂”张炳润在给社会贡献出巨大绿色财富后，消失在了茫茫林海之中。

送葬那天，林场场长沉痛地告诉人们：老人一生简朴，护林 36 年，家里两间土坯屋依旧，山上千万棵大树，他没动用一棵给自己修房子。他一年的护林费收入是 500 元，这次为扑灭山林大火被烧成重伤，医疗费也恰好只用去 500 元。他一生没多花别人一分钱！

为表达对张炳润老人深深的敬意，县领导、林业部门、镇党委政府和街道、村委会联合给老人送上了 36 个花圈。36 个花圈伴随着安息在西大山的“山魂”，与青山长在，与绿水长流……

红烛，闪亮在雪域高原——改变贫困村庄的教师刘让贤

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什巴小学当了 21 年校长的刘让贤，在办好学校的同时，始终把改变当地封闭、落后的面貌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寺尔村一位从北京打工回来的村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前些年本村有人到省城买药，回来说省城有好高的大楼。进去一看，东西真多，逛了好几遍才出来。别人问他怎么不去楼上逛逛，那人大惑不解：“还能上楼？”他竟不知楼上还有二层三层，可以寻梯上去。因为寺尔村没有楼房，大山把文明封在了外面，这就是刘让贤刚来什巴小学时寺尔村的状况。

寺尔村党支部书记李克忠介绍，东山乡有 100 多个山头，300 多条沟壑，没有公路，信息闭塞，至今没有一家乡镇企业，也没有一个集市。寺尔村是一个大村，分上寺尔，下寺尔，昂入沟，什巴沟，有 90.3% 的居民是土族。70 年代末，这儿 80% 以上的村民是文盲，许多人连汉语也听不懂。刘让贤扎在这里 21 年，使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0 年代末，这个村连个会计都找不出来，现在家家户户至少有个小学毕业生，初中生遍地是，高中生也不少，光大中专生就有十几个。

村支书还介绍：“让贤刚来时，入学率只有 50%，让贤可真受苦了。这儿的山，这儿的沟全让他踏遍了，还真让他达到了目的，入学率很快上升到了 100%。现在，村里人观念变了，村民积极送孩子上学，还踊跃为学校办实事。不久前维修校舍，用不着每家每户去动员。村上一通知，群众二话不说，有出椽子的，出劳力的，几乎全村出动。村上前几年攒下了 1.4 万元，村民一致要求把钱存入银行，每年几千元的利息全部用到学校，给老师们买煤过冬，交付电费。逢年过节，就给老师们买些礼物，乡亲们对老师们信任着哩。”

村民教育观念的增强，其实是尝到了识文断字的甜头，尤其尝到了刘让贤要求他们掌握一技之长的甜头。

由于大山的阻隔，古老思想的影响。80 年代中期，当有人做生意而发家致富时，东山乡的土族群众还坚持着重农轻商的老观念，过着靠天吃饭的农业日子。当看到山下川里人热火朝天地做生意时，他们不无嘲讽的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老天爷照顾了东山乡，村里人没事挖沙滩，挖罢了沙滩贩鸡蛋。”

为增强村民的商品经济意识，刘让贤组织学生开展了“采访一个带头经商的典型，提供一份商品经济的信息，寻找一条致富路子”的“三个一”活动。学生们利用假期走访了外乡的 59 个养殖专业户，200 多名靠打工和 136 名靠贩鸡蛋致富的农民，了解了农民外出打工和经商的酸甜苦辣，初步接触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写了《寻找家乡致富路》、《西宁城“站”大角的人》等调查报告。

川里人发家致富的故事打动了山里人的心，土族人渐渐地改变了“养牛耕田，种粮吃饭，养猪过年”的观念，汇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如今的东山乡，土族群众经商作买卖，已不再是新鲜事。而站在山村商品经济潮头的，也正是那些从什巴小学毕业回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人，仅寺尔村就有刘让贤教出的500多个学生。他们有的开起了裁缝铺，有的办起了小商店，有的外出搞副业，成为家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跟着他们，乡亲们开始走出山门，寻求致富的新门路。

谁能想到，这儿的乡亲们不敢用农药，不敢，也不懂得使用地膜技术。刘让贤带领学生们种的6亩实验田为他们解了谜，放了胆。乡亲们的观念变了，耕作方式改良了，生产水平提高了，日子也渐渐红火起来。

在寺尔村一位村民家中，他们夸奖“红领巾气象站”挺实用。原来，因为这儿是山区，电视里的天气预报“管”不到这儿，这儿的龙王爷自己挑着摊儿。刘让贤从省城请来了能人，帮学生们成立了这个气象站。3年下来，他们摸着了这山区龙王爷的脾气，刮风下雨也能事先知道了。

但刘让贤并不满足于此，他想彻底改变这个地区的落后面貌。他把学校不仅看作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而且当作大山的窗口，文明的窗口，当作两个文明建设的基地。

我们参观了刘让贤建立的45岁以下村民的档案，满满一大柜子，他说，绝不能让一个文盲漏掉，要彻底扫盲。他在学校组织了多年的扫盲队，把学生当作文明的种子，撒向大山。有一位叫李元梅的土族学生，天天都帮妈妈认字，一个月后，她妈妈就掌握了100多个汉字，村民们也积极加入到扫盲的队伍中来。

土族只有本族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传统上他们是靠宗教活动流传他们的文化。他们病了不去医院，而是请神汉跳大神，对一些自然现象也用迷信说法加以解释。

在寺尔村周围几个村庄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刘让贤指导学生揭露神汉骗人鬼把戏的故事。例如，一位同学放学回家，见一神汉在他家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大声喊叫着“捉鬼”。他约了几个小伙伴躺在墙后，突然抓起一把土，扔到院子里。土撒在院里的花叶儿上哗哗地响。那神汉吓得撒腿就跑，大喊：“鬼厉害，鬼厉害”。

昂入沟有一眼泉水，有时汨汨冒水，有时干涸。村人曾尊为神泉，而且流传，只要女人或牲畜掉入，则泉眼干涸，多年来有许多人到泉旁磕头烧香。刘让贤请来科技人员，经过认真观察，终于捅破了这层神秘面纱。原来这是一眼季节泉，雨季有水，旱季无水。此事传开后，再也无人到这里烧香磕头了。

刘让贤说：“这儿是我的村庄，这儿有我的亲人，我不做点事儿谁去做？”

刘让贤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完全献给了人民的事业，献给了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他所言：“一名共产党员，要自觉成为一个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人民的人。”38年来，他扎根高原山区，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部开发，献给了山区教育，切实实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火炬颂——记党的好干部江望梅

眼噙热泪，满怀崇敬，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物价局干部先后登台，宣讲了该局干部江望梅种种感人的事迹。言至动情处，台上痛哭失声，台下满场唏嘘。这是洪山区“七一”前夕组织开展学习江望梅系列活动中的一个镜头。

人间别离的时候是伤心的，更何况是永别的时候。1996年9月29日，51岁的洪山区物价局干部江望梅去世了。

死亡单上明显写着，因患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病人最后数月高烧不退，导致全身衰竭而死。此病与长期营养不良和疲劳过度有关，江望梅的丈夫作了证明：“她是个工作狂，不仅上班认真，下班也要处理公务，常常是深夜12点后才睡。”

“江局长是累死的！”同事也作了证明：“去年4月，局里组织干部体检，医生发现她身体虚弱，血液异常，劝她住院检查，她说工作忙推托了。后来，医生给她做了小手术，并开了休息一周的病假条，她出门就撕了。我们‘押送’她回家去，谁知她下午又出现在办公室里。”

江望梅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从记事起，就从父母那里接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江家”的教诲，对党始终怀有朴素的感情。她自己从一个苦孩子，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党员，一名干部，并先后获得市三八红旗手，市巾帼建功立业先进个人，区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

自从手中有了一点权利，江望梅就对自己约法三章：请吃不到，送礼不收，说情不依。无论任何时候，权利是大是小，她始终恪守这一原则。

在分管物价监督检查工作的9年时间里，江望梅组织、带领物价人员进行中小学生收费、医疗卫生等价格检查以及整治乱收费等工作，共查处价格违法行为586件，经济制裁总额达200万元。可想而知，这其中要经历多少权与情，法与钱的考验。一次，江望梅与两位同志到某汽修厂检查，发现该厂有数万元的违法行为。厂负责人赶紧说好话，希望减免处罚，并送给他们每人一箱饮料，一个茶几。江望梅对此予以严厉批评：“你们不送东西，我们依法办事；你们执意要送，我们只好从严处置。”闻此，该厂负责人赶紧停止了“地下行动”。

江望梅不仅在检查中拒吃拒受，就是下乡调查，蹲点，也从不白吃。同事回忆说：“1991年，我曾与江局长在青菱乡搞社教。按理，我们应在农户家吃派饭；但江局长总是尽量在外面买面包、馒头吃。即使在农民家吃，每次饭后，她也总要在碗底扣上10元钱。”

不吃请，不收礼，也许容易；面对亲友的请求，在原则与人情间的选择则困难多了。江望梅每次遇到此类事情，总是站在原则一边。1984年，她丈夫的弟弟因车祸丧生，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婆婆便请任供销社劳资科长的她将弟媳从纸坊调到洪山区工作，以便家人相互照应。江望梅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她说：“我不能忘了自己在党旗下的誓言。”为了弥补对婆婆与

弟媳的歉疚，江望梅主动承担起抚养小侄儿的义务。如今，那位由她提供衣食，求学费用的侄儿已长大成人。

江望梅在工作上是高标准，在生活上却是低要求。她的公文包是用了 30 多年的人造革做的，提带裂缝，拉链不全；她骑的那辆凤凰 28 型男式载重自行车，已骑了几十年，除了铃铛不响，哪里都响。其实，她的条件并不错：丈夫是海军工程学院的教授，儿子、女儿都是研究生毕业。

就因为江望梅那过于简朴的打扮，还使她受了不少“礼遇”呢。一次，她上穿蓝涤卡外衣，下穿军裤，脚穿军鞋，去某地开会。主持人以为她是迷路的农民，反复强调请与会议无关的人退场，弄得场面很尴尬。

在单位，江望梅对公家的钱省了又省。作为局党组书记，她有权坐小车上下班，但她从没享受过。出门办事，她坐公共汽车却从不报销车费。局里给每位领导安装电话，她不要，硬要自费装。她丈夫说：“孩子不在家，我也很少打电话，家里每月上百元的电话费实际上都是望梅办公用了。”

出差在外，江望梅总是拣最便宜的旅店住。1995 年夏天，她与同事赴青岛学习，联系住处时，当地最低标准间每晚每床 48 元。江望梅与该店总经理死磨硬缠要住统铺。经理拗不过她，只好临时在会议室开了几张行军床，结果每人每晚只交 15 元。

住院期间，江望梅对药物价格稍贵一点的针，她就不让打。同事哭着说：“每次送支票到医院，都不敢让江局长看见数额，因为她不让多支。”甚至弥留之际，局里给她开小房间，她都坚持呆在 4 人间病房不肯出来：“局里经费紧张，不能再在我身上花钱。”

江望梅对自己近乎吝啬，对他人却极为慷慨。同事，邻里谁有难事，只要她知道了，她定会鼎力相助。局里的一位干部有一对双胞胎，1994 年 9 月，两个孩子都要上学，交学费困难。江望梅听说后，便主动塞给他一千元钱：“搭帮凑凑吧。”以后同事几次还钱，江望梅都说：“你家困难，不慌不慌。”

一位正经过江望梅家的老农说：“20 年前我正困难的时候，江局长曾资助过我 350 元钱，帮助我全家度过了难关。”据江望梅家人说，这样的事不知有多少：安徽等地遭水灾，她捐款 300 元；一职工去世后，她拿出 200 元……江望梅去世后，有不少人还来其家还钱。

病重期间，江望梅仍然不忘自己是一名党员，关心的还是工作。当洪山区领导去探望她时，她主动提出：“请免去我的职务，让贤能者上，不要因为我占着位置而耽误了工作。”弥留的前几天，她还用微弱的声音询问同事：“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你们坚持了没有？切不可马虎呀！”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的。这火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光明的光彩。”这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一段

名言。党的好女儿江望梅，不就是这样的一個火炬么？

守望滄水三十載——記水文戰線老職工王道貴

“外公，看水位去！”4岁的小外孙每天早晨7时50分总习惯的这样喊。当王道贵拿着记录本走向门前滄水河边时，背着书包的伢儿们也陆续出门了。30年了，三岭山下的人们一见王道贵手拿记录本往河边走，就知道伢们该上学去了。

这里，就是被荆州水文战线称为“水文西伯利亚”的乌溪沟。滄水河源出五峰，从这里流向滄水水库。

按要求，王道贵在枯水季节采用两段制（每12小时观测记录一次）观测水位就够了。可滄水河穿过山涧，水位涨落无常，为完整记录水位变化曲线，他便采用24段制或48段制，有时干脆搬到河边坐守观测。他常常在梦中高呼：“测水去，测水去！”以至老伴称他为“神经病”成了口头禅。守望滄水30年，记载水位曲线30年，险情战报也传送了30年，王道贵没出一点疏漏，没放过一次洪峰。他日思夜想的就是要创出事业上的一份完美。他深知，“只要一丁点疏忽，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就这样，王道贵像守护婴儿般坚守在滄水河。1994年，一条毒蛇把王道贵的脚猛咬了一口，妻子一刀剪断辫子扎在他的腿肚子上，可一道黑脉还是窜上了大腿，当乡亲们把他抬到医院的时候，腿已肿得脱不下裤子。在医院呆了不到3天，王道贵就坚决要回乌溪沟，他担心时间一长水文资料的准确性会出问题。人们把他抬回来了，之后的30多天，都是妻子背他到河边去观测。伤病成这样，他采用的仍旧是四段制。

荆州市水文资源勘测局党委书记杨如军介绍：“有一年，工程师朱崇最跟我到乌溪沟检查工作，下公路往山里走时，雨后的山路穿皮鞋没法走，他就脱下来拎在手里往前赶，没走多远，他的脚掌便渗透了血花。我难受得不行，他却说：‘老杨啊，我们一年顶多来一两回，王道贵可是在这里呆了几十年啊！’这位书记指着车窗夕绵绵群山说：“乌溪沟水文站每月要向市局送一次水样，每一次王道贵他们要背着30公斤重的水样箱翻山越岭步行15公里到刘家场镇再搭车。1992年以后，站上只剩下王道贵一人，这件事就落在他一人身上。”

在王道贵的家门口，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精瘦黔黑的山民，手里夹着一根纸烟。他就是王道贵，身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城里人的印记。他一边带我们在河边和站房里到处转，一边介绍说：“下雨的时候，别人往家里钻，我就往河边跑！”

王道贵也有孤独的时候，他的烟瘾很大，他说40岁以前没抽过烟，可现在他是一根接一根的吸。为什么？因为乌溪沟收不到电视，广播只能收两三个台，报纸一个月才送一两回。乌溪沟的村民们反映：王佬（据村主任介绍，湾子里得此称呼者唯独王道贵一个人）是个最勤快的人。到底是以忙碌驱遣独处荒村的孤寂，还是真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喜欢做事，心里充实”？

在山外人们想方设法创造娱乐环境的今天，深居山沟的王道贵真的就没有一种可以消除孤寂的娱乐方式？“我没学过打麻将，也不愿学，那东西费时费力又耗钱，主要是没意义。方圆几十里，我是唯一的国家干部。我若去打牌，山里人就会说：看，国家干部就是这个样子，拿着国家的工资打牌赌钱。”

王道贵不会玩，只会做事。

做完站的事就义务为周围的山民做事：带山民挖一条灌渠，把水从 2.5 公里之外的水库引到山上的旱田里；每天在家里烧一担开水，门开着，河对面耕田的乡民可以随时进去解渴；种了一大块蔬菜，任凭不善种菜的乌溪沟人随意采摘……他说自己做这些事很高兴，仿佛这就是他的娱乐方式。可是当他独坐河边长时间守望滄水河的时候，孤寂便会伴随困顿屡屡袭来。为了睁着眼睛，他想到了烟，于是就一支接一支地抽到了现在。

30 年中，王道贵只回家乡探过三回亲。问他：“两年后你退休了是否打算回老家？”他说：“我父母和一个弟弟去世时没能回去，那都逢在汛期，脱不开身，再加上这里邮路不通，接到信时已经晚了 10 天，人早升天了；如今在这里安了家，也不想回去了。当然，有几个老乡同学想把我调回去工作。可是那样，这乌溪沟谁来管呢？把滄水河的脾性摸透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退休后我就呆在这儿帮帮接班的同志。”

我们想象：“他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而事实上却又不是。尽管老王在 1976 年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站党支部支委人事变动频繁，致使老王现在还是个“编外党员”。不过他说：“当党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现在用党员标准自省，给党、国家和群众做点实事，我觉得自己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30 个春秋，乌溪沟水文站先后接纳过 50 位水文职工，如今在这里坚守的只有王道贵了。30 年中，由他测报的水文资料重达 80 公斤，摞起来比他身材还高。王道贵脸上的皱纹深了，河床里的石头圆了，他们各自固守着……

给孩子营造出新天地——记全国优秀辅导员贾福莲

贾福莲常说：“我一干起工作就没有病了。”不熟悉贾福莲的人们如果看到她活跃在孩子们中间的情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3年前曾因患癌症做过手术。

贾福莲，大连机车车辆厂子弟学校一名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靠坚强撑着病痛之躯，把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挚爱的少先队事业，奏响了爱的乐章。

从小就争强好胜的贾福莲，17岁到大连机车车辆厂工作，一年以后，不但出了徒还当上了班长。读了函大又读电大，她又成了当时厂里少有的女助理工程师。1983年，她服从组织安排，到子弟学校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就任辅导员的第二天，贾福莲早晨5点多钟就起床了，忙完家务，抱起正熟睡的女儿，深一脚浅一脚的赶往学校。她下了汽车换电车，还要再步行40多分钟，女儿在咿咿呀呀的电车行驶声中喝完了奶瓶中温热的牛奶，接着被送往托儿所。此后很长时间里贾福莲重复着这样一个艰苦的上下班路程。

贾福莲说：“干工作只要想法子去干好，就一定能干出名堂来。”在她的努力下，学校少先队工作开始活跃起来。红领巾广播站、小记者团、鼓号队、“心中的丰碑”连环画展，各种生动活泼的主题队会等组建起来，开展起来。在无线电小组里，学电器专业的贾福莲亲自讲课，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学焊接，识别电路图，学习组装收音机。半年后，全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全部从自己组装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广播节目。贾福莲这样描述孩子们当时的兴奋之情：“声音里带着欢笑，脚步带着跳跃。”

当邓小平同志1984年发出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后，原先就从事计算机工作的贾福莲怦然心动。她在纸板上按机键位置挖出方洞模拟键盘，组建了一个12人的计算机小组，教他们学习电脑入门知识。此事感动了大连机车车辆厂上上下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学校有25台计算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小学计算机教室。在全市少年计算机竞赛中，她辅导的学生占了获得前15名中的12名。

辛勤耕耘带来了丰硕的成果。贾福莲担任大队辅导员14年间，大连机车车辆厂子弟学校少先队和队员先后获得了全国红旗大队等300多个市级以上荣誉称号，贾福莲也先后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优秀辅导员，全国少先队工作有突出贡献一级星星火炬等130多项市级以上奖励。

就在贾福莲一心扑在少先队工作时，无情的病魔开始折磨她。1994年5月，经手术，切除了贾福莲体内已长了8年的疙瘩。但检验的结果表明，肿瘤已经发生病变。接着，医生又对她立即进行了第二次长达7个小时的手术。

手术醒来后，她第一句就是：“没事儿，你们看外面花都开了，我还要领学生去看花呢！”手术后第一天，她缠住医生恳求：“再过几天就是‘六一’了，能让我出院吗？”医生不准许，她就与来探视的学校教导主任，把

“六一”的活动程序从头到尾演练一遍，队旗从哪儿出，谁当主持人，演出哪些节目……

贾福莲说，生命神圣，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活着更美好；但是生命是需要精神支柱的，活着不干事不做贡献，也是一种轻贱生命的行为。“只要我的生命尚存，我将毫不犹豫地全部奉献给红领巾事业。”

住院期间，关心她的人都问她“需要什么”，“缺什么”，贾福莲总是这样回答：“给我带支笔和几张纸，还有少先队的书。请多带些来，我要多写几篇关于少先队活动的稿件。”

难以置信的是，手术后一个多月，贾福莲重又走上了工作岗位，此后再未休息过，哪怕是在她继续治疗的日子里。学校领导劝阻她，她却一笑了之。

不顾病痛，贾福莲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少先队工作。“机车雏鹰万里行”、“跨世纪雏鹰爱大连”等活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针对有人说话不文明的情况，贾福莲 1996 年发动孩子们调查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总结调查结果，发起了“七个不”活动，即不说脏话、粗话，不乱穿马路，不损坏公物，不随地吐痰，不破坏绿化，不打电子游戏机，不破坏公共秩序。学校少先队员与“手拉手”学校的少先队员还致信市领导，表示要用他们的小手拉住爸爸妈妈，叔叔阿姨的大手，开展“七要七不要，人人争做文明市民的活动”。这一举动受到市领导的肯定。

贾福莲在一次调查中发现，全校近千名学生中缺少父亲或母亲的孩子竟然占 5%。她把这三、四十个孩子全部召集在一起，建立一个跨年级的“心心中队”，自己兼任中队辅导员。她平时特别关照这些孩子，给他们送衣服，学习用具；节假日，她单独带领这些孩子游玩，领他们唱歌，跳舞。“心心中队”的所有孩子还得到了一个破格待遇：穿上新衣服，化好妆，在少先队大队部的星星火炬前留影。当时的这些情景，这些缺少亲情的孩子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的照片，如今许多孩子仍奉为至宝。

“爱是美丽的、幸福的，但决不是轻率的许诺，而是无怨无悔的给予和任劳任怨的付出。”这是贾福莲的人生感悟。即便是在她身患癌症的时候，她也在用一举一动实践着自己爱的誓言，传播爱的种子。

贾福莲用自己的爱心换来了孩子们纯真的喜爱，不论贾福莲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一群孩子围着她转。

回首 14 年的辅导员生涯，43 岁的贾福莲只是说：“庆幸自己在而立之年步入到辅导员行列之中，得到了多数同龄人体会不到的与孩子们一起生活的充实与欢乐。”

他，是 154 个儿子的爸爸——无穷父爱的使者赵春翰

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有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 22 年间先后收留了 154 个流浪儿、孤儿、低能儿和走投无路的社会青年作“儿子”，将他们培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就是今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成都铁路局优秀共产党员，贵州省六盘水铁路医院院长赵春翰。

事情还得从 1975 年说起，这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李启学的青年坐火车为逃避补票跳车摔成重伤，不省人事。赵春翰发现后，把他背回卫生所全力抢救，接着，又把他安排在自己家里疗养 1 个多月，当李启学伤病痊愈时，赵春翰为身无分文的他准备了路费。可是李启学视救命恩人为再生“父母”，说什么也不愿离开。当时赵春翰正领着职工自己动手采石料、烧石灰、扩建卫生所，需要人手，便把他留下了。这就是赵春翰收留的第一个“儿子”。

没想过了几天，李启学又带来一帮小兄弟，说是过去一起外出谋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赵春翰不忍心拒之门外、统统收留了。他一边领着他们劳动，一边教育他们怎样做人。1 年后，卫生所新房盖好了，他的“儿子”队伍发展到 7 人。他区别不同情况，安排他们养猪养马，或负责所里的清洁卫生工作，智力好的培养“赤脚医生”。

1983 年，赵春翰调任六盘水铁路医院副院长。官升了，可“浪子”队因无人照管却散伙了，有的又沦落街头乞讨、流浪，有的报复杀人，走了犯罪道路。赵春翰得知后十分痛心。他找回部分原有人员，又到车站、饭店角落领来一些流浪儿，“队伍”一下子发展到 20 来人。

赵春翰从此没有了节假日和星期天，他带领大伙，在医院背后的半山坡上，建起简易的厨房和住房，率队把铁路地区的垃圾和卫生全包了。贵昆铁路六盘水地区分布着 7000 多名铁路工，维持铁路正常运转的各站机关都集中在六盘水市，共 2000 多户人家每月要产生 200—300 吨生活及其它垃圾，5 吨的卡车要装 40—60 车。他们的活，就是从一个个垃圾坑道里把垃圾掏出来，然后背运到装运垃圾的卡车上。最初每户每月支付垃圾费 3 角，后来增加到 1 元。这便是支撑“浪子”队生存和发展的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

夕阳西下，医院的篮球场上活跃着打篮球和羽毛球的人群，他们大多是赵春翰的“儿子”们。

16 岁的孤儿陈顺国对我们说，他爹死的早，妈改嫁后，没人管他，11 岁就出来流浪。两年前的一天，他从六枝沿铁路线捡吃的来到水城，看见现在的队友在铁路上干活，就跟着到了医院，赵院长看他可怜，就把他收下了。

眼下 30 余人中，几乎都来自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乌蒙贫困山区农村。原因多是生活无着落或走投无路了，有的还来了几兄弟。

事实上，这里已不单纯是一个求生的场所，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

里是一座净化心灵的“熔炉”；一所改变人生道路的“学校”。由于赵春翰的言传身教，不少人不但学会了如何做人，还在劳动中学会了一门可以谋生的手艺，如木工、泥水工、纺织等，多数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少人从这里鼓起前进的风帆。

何登学，六枝特区新场乡岩脚寨村人，今年 20 岁。生母死后，不堪忍受继母的打骂，13 岁那年冬天跑出家门到火车站捡吃的，被赵院长发现后领了回来。伙伴们都说他刚来时，又矮又瘦，可现在已长成壮壮实实的大小伙子了。他聪明伶俐，搞啥像啥，已是编织藤筐的一把好手。

今年 35 岁的六枝农民王坐才，13 岁那年父亲去世后便出家游荡，并学会了用赌博骗人钱财，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投靠了赵春翰。受赵春翰的熏陶，他不但改掉了恶习，还当了队长，娶了媳妇。由于学有专长，1991 年冬离队到贵阳等地当了“小包工头”。他手下已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而且大多是与过去一样的“流浪者”。因此有人说老赵“后继有人”。

22 年来，赵春翰还直接帮助 19 个“儿子”成了婚，其中有 12 对是他张罗着在医院结合。赵春翰认为，这是让大龄“儿子”最终安居乐业的有效办法。

22 个春夏秋冬，赵春翰先后迎来送走 154 个“儿子”。他们中许多人曾被视为社会“渣滓”，被人瞧不起。但赵春翰却像慈父一样关心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他们的前途。他们打心眼里佩服他、感激他、爱戴他，都说赵春翰院长“比亲爹还亲”。因此，只要是赵春翰认准要干的事，他们都会积极地去干，不顾自身安危地干。

1991 年夏天，六盘水地区遭受多年不遇的洪灾，梅花山铁路大隧道被洪水冲坏，赵春翰率医务人员和部分“儿子”及时参与了抢险。洪灾过后，又发生严重旱灾，水源枯竭，疾病蔓延，赵春翰带领 16 个“儿子”头顶烈日，身背干粮，帮助水电工区的同志堵漏移管，解除了水荒。

更令人们难以忘怀的是 1994 年夏天，六枝境内沿铁路两旁的村寨发生大面积传染病，疫情迅速向铁路两端蔓延，几天内，发病人数增加到上千人，赵春翰组织医务人员和十多名身强力壮的“儿子”队员，火速奔赴疫区。“儿子”们每天背几十公斤重的药水或石灰，与有关人员一道，对疫区进行消毒。赵春翰称他的队伍是一支“敢死队”，参与打硬仗 48 天，有效地遏制了疾病的蔓延，受到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称赞。

赵春翰带领“浪子”队员参与干脏、累、苦、险活，都是尽义务，没有分文报酬。有人粗略统计，近年来赵春翰和他的“浪子”队参与铁路和医院建设做义务工不下 800 个，为国家节省资金 8 万元以上。

赵春翰的先进事迹，尤其是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浪子”队，在当地广为流传，许多农民兄弟视他为救苦救难的“神仙”。在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赵春翰正准备大干，他领着“浪子”队在梅花山区创办了两个农场，种植粮食和蔬菜，养牛，养羊。他力求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能量，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党的温暖。

带给人甘泉的“铁人团长”——打井队队长李国安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使呼和浩特市的气温骤降到零下 20 摄氏度。冒着刺骨的寒风，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火车站，为突发重病的李国安送行。

救护车缓缓进站，不少人当场哭出了声。他们无法相信眼前这个生命濒危的病人，就是历尽艰辛终不悔，20 多年跋涉边塞沙漠，搏击沙暴狂雪，为边疆军民找水打井的“铁人团长”。

担架上的李国安昏睡着，只有蜡黄的脸上不时滚落的汗珠，表明他还活着。

人们把李国安抬上东去的列车。这一天，是 1993 年 12 月 12 日。

草原上的蒙汉同胞离不开他们心中吉祥的“水神”。是李国安带领的给水团在荒原上一次次找到了甜水，把沙化了的草原变成了一方方充满希望的绿洲，人们默默呼唤：“李团长，你可要好好回来呀！”

解放军总医院全力抢救这位受到过江泽民亲切接见的优秀干部，李国安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但依然存在着重伤乃至周身瘫痪的危险。

1994 年 4 月 1 日，当李国安被人搀扶着走下地铁站，又挣扎着爬到地面之后，他仿佛又恢复了以往的形象。那短短的 84 级台阶，他足足攀登了 2 个小时。他找到医院领导，说什么也要出院。

医生和护士及北京军区领导没能阻止住李国安早已下定的决心，他的心早飞到了边疆。在北京的家，他只住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便让人送到了车站。谁料，刚刚蹒跚着挪到站台，列车却已开动了。望着远去的列车，李国安仰天长叹，一个劲地埋怨不争气的腿……

妻子了解自己的丈夫，躺在病床上，他是自己的国安；站起来，他就是北疆荒原的给水团长。她默默出站，花高价买了当日发往呼市的下趟列车票，强装笑颜把丈夫搀上车。一转身，已是泪流满面……

回到阔别 4 个月的团队，李国安恨不得把病榻上的时间都抢回来……他提出考察 8000 里边防水文情况，遭到了团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强烈反对。“我这条命还不是党给的，不能为党工作，就是再活 20 年又有啥意思？再说，过了这个季节，就要再等一年……”

无法描述那数不尽的戈壁大漠和千沟万壑汇成的荒原奇路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险峻。为了减缓颠簸，李国安让司机用背包把自己捆在座位上。烈日贴着不尽的滚烫的沙砾，吉普车内闷得像蒸笼，血水和汗水一次次把李国安的军衣浸透，伤口和军衣又一次次粘在一起。

司机小马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两个月后，他心疼得再也开不下去了，伏在方向盘上“呜呜”地哭起来。李国安一惊：“小马，怎么了？”“团长，咱们还是回去吧。这样下去，你会把命赔上的。”李国安拍拍小马的肩头：“把命搭在党的事业上，值啊！病魔不可怕，就怕咱怕它。咱不怕它，它一点也不可怕。共产党员就是要活着干，死了算。”

送走了沙暴肆虐的春天，又送走了酷热难当的夏季。李国安和司机在风里、雨里跋涉了整整4个月。10月24日早晨，他们结束了24800公里的路程，回到团队。

这是一次用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胜利，李国安体重下降了10公斤。但正是这次超越生命的远征，使他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举：掌握了8000里边防的水源分布详细情况，写出了22万字的边疆水文地质专题调查报告，确定了109眼井位，收集了12麻袋形形色色的玛瑙化石，建起了我军第一个水文地质博物展览室。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腰痛和对边疆缺水的极度焦灼，使得李国安无法入睡。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推门一看，是从百里外的托克托县团结村赶来的两位老大爷，身上的霜就像洒了一层面粉。这个祖祖辈辈喝怕了苦水的村子，去年好不容易凑足钱请了一个打井队，结果送给他们的还是苦水。

满是厚茧的双手捧出一个鼓鼓的面袋：“团长，这是俺们全村凑起来的一点钱，村上穷，实在拿不出更多了，您就帮帮我们吧。”说着，哗啦啦把钱倒在了办公桌上。

那是一堆什么钱哟，有壹佰、伍拾的，也有贰角、壹角的，连伍分、贰分的硬币也掺杂在里面。李国安心在颤，不觉得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他叫上团党委一班人，拉上两位老人直奔团结村。

贫困和疾病几乎充满了村子的每个角落，长期饮用含着大量砷和氟的水，不少人年纪轻轻就牙齿脱落，有的甲状腺肿大，颈上像挂了个大葫芦。就为这样的水，蒙汉两族还常常争得不可开交。

在一户牧民家，李国安舀起一瓢啤酒色的水，一口气喝了下去。他当场拍板：贴钱，也要让群众喝上甜水！

隆隆钻机震撼着村头的荒野，村里的老老少少每天像看大戏一样，围坐在工地旁。钻杆钻到285米，带出了一个300万年前的湖蚌化石。

“是龙蛋，龙王显灵了！”老年人张罗着修庙。

年轻人不服：“要是龙王，不早就喝上甜水了？”

龙王没有显灵，冒出的水是浑的。喝惯了苦水的乡亲们说：“甜就行，浑点没啥。”

李国安和战友们一连洗井六天六夜。第七天凌晨，清澈的泉水涌了出来，300多年的古老村庄沸腾了。乡亲们杀猪宰牛，要用蒙汗两家最隆重的礼仪慰劳官兵。部队只得深夜悄悄回撤，群众还是涌上村头，把车队团团围住，直到乡里的干部反复做了工作，才让开一条路。那一夜，村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打着手电把部队送出10多里，洁白的哈达披满了车头……

这件事给李国安的震动很大。在团党委会上，他真诚地说：“我们不能等群众找上门来，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我们心里要真正装着他们，做什么事都应该用群众心中的秤来秤一秤。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啊！”

近 5 年，给水团为边疆打井 125 眼。他们在寒冬腊月率先为金川开发区打成了第一口供水井，确保国家批准呼和浩特市建立的第一个开发区来年春天引来了投资商；他们为二连浩特打出的日出水超千吨的深井，使这个以往缺水的边塞村庄从此充满生机……

草原农牧民记住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恩情，他们先后为给水团立了 7 块碑，赠送了 125 面锦旗和 10 多块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感叹：“这些碑看起来是立给李国安他们的，实际上是给我们党和军队立的丰碑啊！”

